



同文馆

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杜威

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

[美] 斯蒂文·洛克菲勒 著

赵秀福 译

John Dewey

Religious Faith and Democratic Humanism

Steven C. Rockefell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同文馆

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杜威

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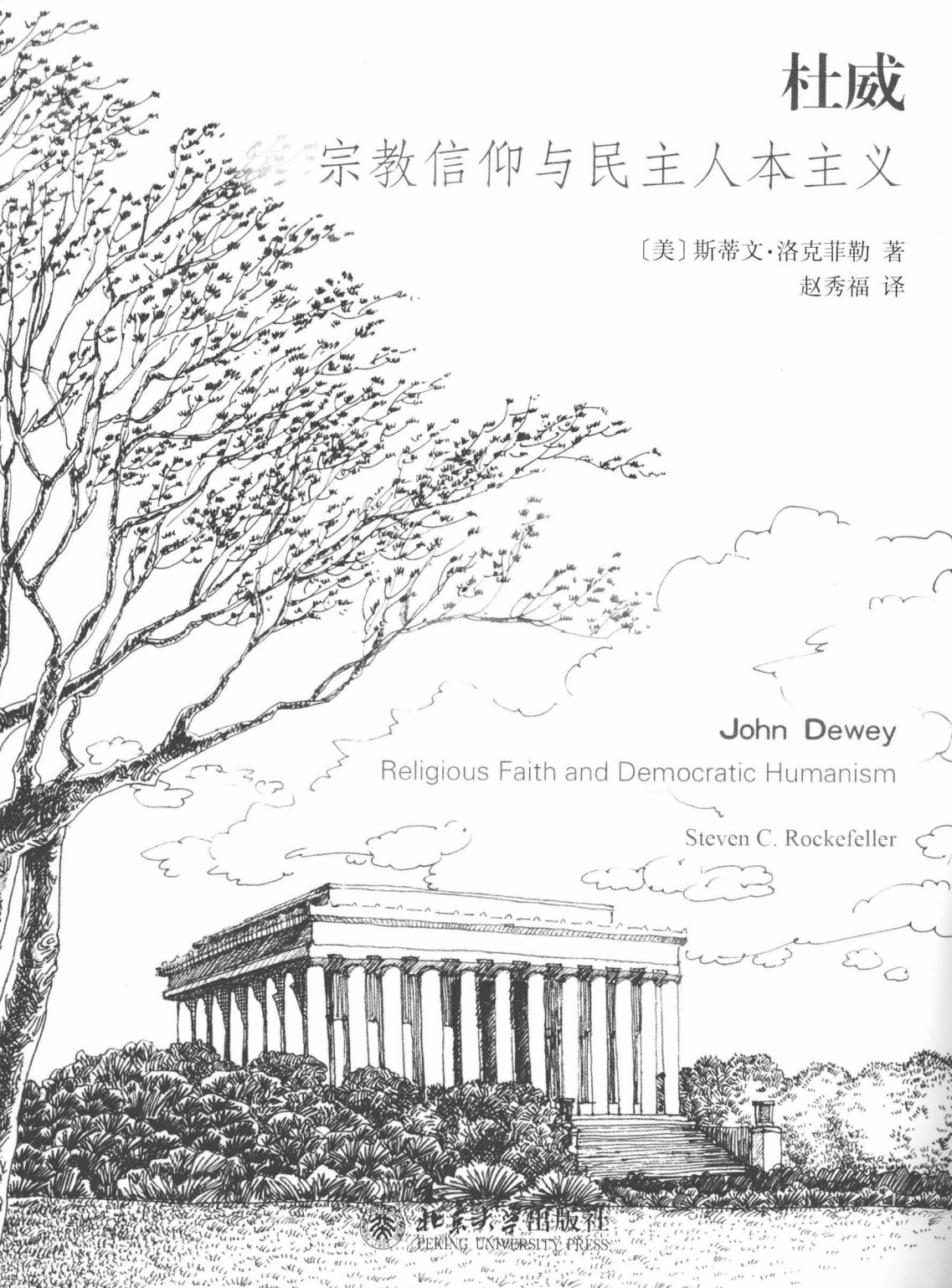
[美] 斯蒂文·洛克菲勒 著

赵秀福 译

John Dewey

Religious Faith and Democratic Humanism

Steven C. Rockefell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42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美)斯蒂文·洛克菲勒著;赵秀福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同文馆·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6389-4

I. 杜… II. ①洛…②赵… III. 杜威,J. (1859~1952)—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B7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9122 号

JOHN DEWEY: Religious Faith and Democratic Humanism by Steven C. Rockefeller. Copyright © 1991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

著作责任者:〔美〕斯蒂文·洛克菲勒 著 赵秀福 译

责任编辑:王立刚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6389-4/B·086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39.5 印张 60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杜威归来(丛书总序)

——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再次对话

孙有中 彭国翔 安乐哲

新世纪伊始的几十年里,中美关系似将成为这个世界各个层面的最重要的保障。不过这种被双方利益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关系并不稳固,甚至有时还很脆弱,并且由于中美文化间缺乏深入的理解,双方的关系亟待推进。要推进这一关系不仅需要能够传达共同价值和文化渴望的词汇,同样也需要一种能够表达相互差异的语言,这种差异使文化交流成了相互激发和丰富的契机。

这个译丛介绍的是对美国哲学的研究性著作,而且初衷是为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美国真正的本土哲学,在介绍的过程中,纠正人们对实用主义的流俗见:实用主义鼓吹的是权宜之计和投机主义,不配被视为伦理学。

这个译丛更大的雄心是鼓舞人们接续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的对话。为此,丛书的主编甄选出书目,经过相关领域的行家里手的倾力翻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努力,最终呈献给中国学界和广大读者。

毋庸置疑,在美国哲学与中国的“夙交”中,杜威是最重要的代表。就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杜威在其哥伦比亚的学生胡适和蒋梦麟的热情邀请之下来到中国。当时胡适和蒋梦麟已经在学界和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崛起,成为重要的革新者。在华的两年间,杜威在华夏大地周游讲学,刚刚起步的中国媒体不惜笔墨,广为报道。但罗伯特·克罗普顿和吴俊生在其编纂的《约翰·杜威:中国讲稿1919—1920》中说:“杜威在中国大学里的哲学学者中间没有赢得多少拥趸,他们在欧洲

受的教育,也继续师从德法的哲学潮流。”^①在当时烈火烹油的革命狂热下,杜威的思想被当时的激进听众望文生义地“误读”了。他们觉得杜威的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需要更有效用,而非对专业的哲学领域。这种对杜威的误读只要不加以助长,是可以谅解的。^②

如今,我们有条件按照美国哲学本然的革命性品质对其进行重读,儒家哲学和美国哲学间的声气相通已被当代学界所察觉,在这两个传统中进行对话的里程已然发轫。

这一对话的开始之际,我们或许会受到这个事实的鼓舞:自称是“美国”哲学家的移民怀特海说过:“要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要想了解杜威,去读孔子。”^③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进一步指出,他的“有机主义哲学似乎更接近中国思想的某些流派”^④。可是,同样是这个怀特海,在其他地方也曾经有点大言不惭地宣称:在哲学活动中,有趣比真实更好。综合这两点来看,怀特海这种地位的哲学家建议我们将和他“同父异母”的同胞杜威和更具异国色彩的孔子加以串读(tandem reading),这即便不是作为真理的谷仓,而是作为启迪的源泉,或许更佳。不过,真理却是所有事物中离我们最遥远的。

怀特海对于他与杜威和孔子所共享的那种过程性的感受(process sensibilities),似乎多有忽略,并且,怀特海在事实上也显然没有深思作为“实用主义者”的杜威和孔子。在怀特海看来,杜威和孔子都服膺于那种他所认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naive empiricism),而除了屏蔽掉最枯燥乏味的哲学探险之外,那种经验主义自身也乏善可陈了。怀特海在将杜威和孔子联系起来的审视中,重演了威廉·詹姆斯在《实用主义》(1907)中辨识出来并加以说明的两难困境,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

① Robert Clopton and Tsuin-chen Ou, *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3, p. 13.

② 见顾红亮《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亦可参见张宝贵《杜威与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③ 参见 Lucien Price,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4), p. 145.

④ *Process and Reality*, Donald Sherbourne correct edition, N. Y., Free Press, 1985, p. 7.



的这一困境常常使我们的哲学进路遭受挫折。^⑤

怀特海首先有力地批判了唯理论的基督教神学,通过真理的形式化而驱逐了新奇妙趣。他接着突然转而攻击杜威和孔子,说他们创造了一种逃避了终极问题的经验主义,而终极问题是经验中简单事实的基础。此处,怀特海将孔子和杜威明确地批评为这样一种实用主义者:即他们将兴趣局限在单调的事实上,从而遏制了这种大有潜力的情况:那就是所谓“愚蠢”和“多余”的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新奇思路。怀特海对孔子太苛刻了,在他看来,孔子导致了一个事物停止变化的时代,他责备孔子造成了中国文明的僵化凝滞。^⑥ 不过即便在他轻蔑的评论中,怀特海仍旧认识到儒家哲学的实用主义向度,这至少有助于鼓舞我们通过揭示杜威和孔子的深刻来捍卫这两位思想家,以对抗怀特海本人的傲慢。

事实上,在怀特海所处的时代,对他本人以及他的同行来说,在杜威与孔子之间进行比较的任何思路都令人迷惑。但是,从我们目前的高度而言,我将论证:我们能够界定一套看起来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彼此相关的历史境况,多年之后,这种境况或许会得到权衡与考虑,并且,作为事后之见,或许还会被诠释为那样一种情况,即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这样一种对话。我们目前的世界是否正在发生显著的改变,能够使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珠联璧合呢?杜威的归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这一次不再遭遇五四运动的漩涡,杜威能成为一股助力去推动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吗?随着七十多个孔子研究机构在全美国的建立,对儒家哲学的精微理解最终会到达美利坚的海岸吗?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几乎全部是欧洲哲学,并且掌控了世界最高学府的坐席和课程,在波士顿、牛津、法兰克福和巴黎如此,在北京、东京、汉城和德里也差相仿佛。如果亚洲哲学和美国哲学在海外受

⑤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2000).

⑥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p. 176-177.

到忽略,那么在它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中,它们也同样被边缘化了。^⑦

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利坚,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哲学等旗麾之下,西方哲学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批判。这场批判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所罗门(Robert Solomon)的话来说就是“超越的伪装”(the transcendental pretense),诸如观念论、客观主义、宏大叙事(the master narrative)和“所予的神秘”(the myth of the given)。当然,在杜威所说的“哲学的谬误”(the philosophical fallacy),批判的也是同一个目标。“哲学的谬误”激发了杜威对观念论和实在论两方面的批判,杜威批评的是这样一种假定:一个过程的结果反而被当成了这一过程的动因。^⑧

过去的二三十年,尤其在美国国内(不仅仅在美国),我们见证了古典实用主义兴趣的复苏,其标志就是对美国哲学演变的深入研究与

⑦ 诚如 Raymond Boisvert, *John Dewey: Rethinking Our Time* (Albany: SUNY Press, 1998) 一书中所述:在 20 世纪初,美国哲学家不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曾荣耀一时,但其影响在二战之前就烟消云散了。Harvey Townsend 在其 *Philosophical Id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34) 中指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美国哲学的状况:

美国哲学在美洲是一个受到忽略的研究领域。之所以如此,部分地出于对欧洲的敬重。爱默生(Emerson)和惠特曼(Whitman)呼吁美国人思考他们自己的思想,歌唱自己的歌曲,他们的呼吁仍然被置若罔闻。无法完全说服美国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灵魂。

在随后两代人中,这种偏见仍旧显而易见。在《剑桥西方哲学史》(1994)的前言中,当提到该书不同部分的作者时,主编 Anthony Kenny 指出:“所有作者都受过英美传统的训练或授教于英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作者都属于英美的哲学风格。”但是,在该书的主体中却并没有提到美洲的思想,没有爱德华兹(Edwards)、爱默生、皮尔士、詹姆斯,也没有杜威。有关美洲所提到的东西,只有在索引中出现的“美国革命与柏克”、“托马斯·潘恩”、“杰斐逊”,并且杰斐逊在正文中是作为“潘恩的朋友”出现的。显然结论是:美国哲学,即使是接近英美传统的思想家们,在塑造西方思想特征的过程中也作用甚微。委实,在美国,很少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研究项目能够使学生直接受到美国哲学的认真而持久的训练。就像日俄战争是在日俄两国之外的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一样,美国的大學当前也基本上是各种外国学术角力的战场。

⑧ 杜威早就看到,作为“哲学思维最为流行的谬误”,就是忽略经验的历史的、发展的和情境化的方面。正如他所见到的,其中方法论的问题出在:“从赋予个别因素以意义的有机整体中抽象出某一个因素,并将这一因素设定为绝对”,然后将这一个因素奉为“所有实在和知识的原因和根据”(John Dewey, *Early Works* 1:162)。有关历史、发展以及“哲学谬误”的脉络,参见 J. E. Tiles, *Dewey: The Arguments of the Philosophers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 19-24。



日俱增,其中最好的就在这个译丛之中,这些凸显了杜威的贡献的专论把杜威的特点总结为:将常见的语汇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加以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当代学者们正在讲述一个重要的新故事,如今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杜威的中国学生没有真正理解他,其实扩而言之,如今的美国学生何尝不如此。

直至晚近,专业的西方哲学仍然忽略亚洲哲学而怡然自若(更不用说非洲和伊斯兰传统了),他们对于这些传统是怎么回事并不在意,这些哲学只不过是他们脑海中一些匆匆而过的印象。西方哲学乞灵于这样的理由:那些思想流派并非真正的“哲学”。如此一来,职业产生了“比较哲学”这样一个术语。这是一个奇怪的范畴,它与其说是在哲学上得到论证,还不如说在地域上得到说明。

但是,在“经典与多元文化主义争论”的脉络中,由一种在美国大学教育中推行“国际化”的明智需要所驱动,非西方的各种哲学传统已经我行我素地对哲学系的课程构成一种显而易见的“入侵”。从熙攘的世界会议到檀香山比较哲学的小圈子,再到波士顿儒家,比较哲学运动已经肩负重任,并且在目前看似巨大的西西弗斯式的劳作中也创造了某些契机。对比较哲学运动来说,胜利仍旧遥远,但是,即使有朝一日当胜利到来时,那将会是一场仁慈宽大的凯旋之舞,也就是说,在这场斗争中,成功也就是将“比较哲学”这一别扭的范畴从哲学词典中废除而已。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边,如今的中国不再满足于做世界的唐人街,而是正在经历着其悠久历史中最大和最彻底的变革。虽然当代西方哲学忽略了中国,但自从清季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引进以来,中国人广吸博纳以求富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一方面忠于自己的传统并具有活力,一方面又是具有吸收力并绝对是“比较性的”。在20世纪,马列主义经过几代人不断中国化,而刚开始的杜威实用主义以及儒学则被取而代之。同时,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许多杰出人物像张君勱、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则从欧洲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中寻找标准,将中国思想视为二流的概念(Chinese second order thinking)论证为一种值得尊重的哲学传统。不过对于我们所期待的对话而言,要注意的是:在五四时代儒学与杜威最初的相遇中,儒学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

分子们斥为阻塞中国动脉的血栓,妨碍了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那些新观念的鲜活流通,而杜威则被当成了一副解毒药。

今天中国当代哲学有了明显的发展,从初期的康德、黑格尔,到现在的维特根斯坦,尤其是现象学和海德格尔。从康德到海德格尔的兴趣转变对于儒家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对话的开启关系重大,尤其是对于本土思维的现代相关性,就更为重要。^⑨ 中国主权在 20 世纪中期的重新确立,以及最近几十年,中国作为一股世界力量的稳步成长,始终伴随着一种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更新的、批判的意识,以此作为自我理解的资源和平台,来应对被耽搁的但却不可阻挡的全球化。

然而欧洲哲学曾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标准的哲学,西方学术中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被中国学者公允地忽略了,因为他们发觉自己很难从西方人对中国传统的思考中学到什么。过去的几十年,力图对中国文化进行转变和阐释的中国学者从关注被忽略的中国学者要贡献什么,扩展到了文化争论,并且对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也日益关注。西方汉学的翻译和讨论在中国获得了斐然的反响。

这种相互渗透和补充的条件环境已经为开启美国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之间的新对话搭起了舞台,儒家哲学随着中国人对其传统的自尊和自豪感的生长已经恢复了显赫的位置。这套丛书是我们以及中国学界同仁认为的当代美国哲学研究中最好的著作,是我们推动这一对话的努力。

彭国翔 王立刚 译

(编按:孙有中教授审读了丛书中《杜威与美国民主》、《造就道德》、《理解杜威》、《阅读杜威》等译稿;彭国翔教授审读了《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杜威与道德想象力》、《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等译稿。)

^⑨ 见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一本学术书,该书获得了出乎预料的欢迎。

前 言

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生平和思想的故事,是他所属的民族极为重要的叙事之一,因为这些叙事有助于该民族的人们认清其共享的认同及其共同生活的意义。本书的目的即在于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述与杜威的故事相关的思想、道德和宗教的传统。对杜威的工作之更深层次的、持久的意义进行再发现和审慎的评价,不仅对于美国人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当今整个世界那些热爱自由,追寻民主的生活方式的人,也是极为重要的。

20 世纪初的几十年,杜威在其生涯的巅峰状态,对美国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思想在国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到 20 世纪 50 年代,人们先前对其著述所有的广泛兴趣开始消退。部分原因在于新一代人的出现而这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受到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更为悲观保守的情绪的影响。分析哲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正统神学以及其他运动在大学里流行开来,因此在许多团体那里,杜威杂糅了自然主义、实验主义和民主人本主义的(democratic humanism)思想,逐渐被疏远了。但是,一小部分哲学家和学者仍继续宣传杜威思想各个方面的重要性。另外,开始于 60 年代的一项重要的学术举措,历时 25 年之久,倾注了许多学者辛勤的研究和编辑之功,使得杜威的文集,包括数百篇文章和三十多部专著得以汇集和整理,并由杜威研究中心和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在 80 年代,人们重新认识到了经典美国哲学传统的价值,关于杜威的学术研究明显增多。目前,一种对杜威的兴趣的重要复苏正在形成,就这一点而言,托马斯·M. 亚历山大(Thomas M. Alexander)、雷蒙德·博伊斯沃特(Raymond Boisvert)、拉里·A. 希克曼(Larry A. Hickman)、理查德·罗蒂

(Richard Rorty)、拉尔夫·W. 斯利珀(R. W. Sleeper)、罗伯特·B. 威斯布鲁克(Robert B. Westbrook)和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都发表了重要的论述杜威哲学的新成果。在这些著作中,杜威的思想根据美国实用主义的历史得认检讨,涉及的方面包括其逻辑学、语言哲学、形而上学、社会思想和艺术理论。其他方面的研究,包括杜威的传记和哲学分析也正在进行之中。

通过把杜威的生平看做是一种美国所独有的、民主的追求理想的过程,并通过从宗教意义的角度对杜威的一生和贡献提供一种批制性的检讨,本书希望能够推进重新评价杜威的进程。此前将杜威作为一位宗教思想家来处理的著作,包括布鲁斯·库克利克(Bruce Kuklick)的专著《牧师与哲学家:从乔纳森·爱德华兹到约翰·杜威》(*Churchmen and Philosophers: From Jonathan Edwards to John Dewey*, 1985),在视域上一直受到局限,仅仅探讨更为复杂的故事的某些特定方面。本书也强调杜威的生活经验与他的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试图让人们关注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视野的力量。从其宗教意义与价值的角度接近杜威的思想,为进入、理解并能欣赏杜威终生所追求的恢弘而圆融的视野,提供了一种格外有效的方法。因致力于研究杜威而得以领略到那种包容性极大的哲学视野,这是那些坚持杜威研究的人所获得的最为有益的经验。

看来现在是重新聆听杜威的教诲的时候。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道德困惑的时代,一个精神追寻的时代,一个文明与自然的关系充满危机的时代,也是一个在创造自由的、由于信守民主价值而凝结在一起的世界的过程中重新燃起希望的时代。在美国,20 世纪开始于这样一种笃定的信念,即民主将很快被世界各地的人民欣然接纳,文明所蕴涵的全部创造力将得以实现。然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人性一再迷失,陷入了战争、压迫、种族灭绝和滥用自然资源等自我毁灭的各种(*self-destructive*)模式之中。尽管如此,随着 20 世纪的行将结束,对于苏联和东欧极权主义的反抗,柏林墙的开放,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以及全球性的对于环境问题的觉醒,都标志着民主的希冀和渴望已经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且有可能得到实现,虽然仍面临着极大的

障碍。此时此刻,再度聆听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那些曾提出富有创意的自由哲学的男男女女的声音,领略其深刻的道德和宗教信仰,思索其对人类精神与自然的相互依赖性的敏锐洞察,我们肯定会有新的感悟。在这些早期思想家的著作中,你找不到关于我们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宗教问题的现成的或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们对于世界和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的理解,充满了智慧。杜威的哲学无疑是值得进行仔细研究的,当然,我们也要始终牢记他本人对于新旧观念所采取的那种审慎的、实验的方法。

离开我有幸结识的若干机构和许多先生、女士们的帮助与支持,本书的写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但我想向那些对我有特别帮助的人和机构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首先,我非常感激我的两位老师,丹尼尔·戴·威廉斯(Daniel Day Williams)和小约翰·赫尔曼·兰德尔(John Herman Randall, Jr.)。我在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和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生时,他们引领我进入了美国自然主义的传统和约翰·杜威思想的领域。在我开始研究和撰写学术著作之初,与约瑟夫·J. 布劳(Joseph L. Blau)、劳伦斯·A. 克雷明(Lawrence A. Cremin)和乔治·戴奎臻(George Dykuizhen)的谈话使我受益匪浅。戴奎臻的《约翰·杜威的生平与思想》(*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1969)是第一部试图从整体上审视杜威生平的重要著作,对杜威的传记感兴趣的任何人而言,仍然是无价的资源。我想向杜威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杜威文集》的主编乔·安·博伊斯顿(Jo Ann Boydston)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她和她的同事们对我的研究所给予的周到细致的帮助,感谢她对手稿所做的评论。在与马尔科姆·戴维·埃克尔(Malcolm David Eckel)、罗伯特·L. 弗姆(Robert L. Ferm)、约翰·麦夸里(John Macquarrie)、鲁本·雷尼(Reuben Rainey)以及拉尔夫·W. 斯利珀(Ralph W. Sleeper)等人就我所进行的杜威研究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我也获益良多。我也向小詹姆斯·A. 马丁(James A. Martin, Jr.)、威廉·奈威尔(William Newell)和布鲁斯·威尔希尔(Bruce Wilshire)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手稿所做的有益的评判,和他们对我的鼓励。

我感谢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为我提供了休假的机会,使我在能够在关键的时刻推进我的研究工作。我还从以下机构获得过合作的机会,因此在这里表达我的谢意,这包括南伊利诺伊大学的莫里斯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特勒图书馆的特藏部,佛蒙特大学的贝利/豪图书馆特藏部,密歇根大学的密歇根历史藏品馆、国会图书馆手稿部和米德博利学院的斯达尔图书馆。我还想向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感谢其允许我从《约翰·杜威文集》和《约翰·杜威诗集》中引用了很多资料。

多年以来,伴随着我的研究和写作的进展,珍妮特·温科勒(Janet Winkler)为我打印和校读了数不清的杜威研究材料,对她友善而周到的帮助,我表示不尽的感激。克莱尔·威尔逊(Claire Wilson)非常耐心地把整本书输入文字处理系统,并做了数不清的修改,还不辞劳苦地为我的研究提供帮助,修改注释,校对,等等,为此我向她表示深深的谢意。我还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路易斯·沃勒(Louise Waller)、安·米勒(Ann Miller)和莱斯利·比亚勒(Leslie Bialer)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关心和周到细致。

多年来,我的家人对我的爱和理解使我安心地从事研究和著述。我特别感激劳拉·蔡辛(Laura Chasin),我从小就在她的爱和陪伴下成长,她对于杜威的理解加深了我对于杜威的理解,她还对本书的部分章节进行了仔细的批评,为本书增色很多。我对芭芭拉·贝罗斯·洛克菲勒(Barbara Bellows Rockefeller)充满了无尽的感激,因为我们曾经常就杜威和美国文化畅谈,往往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她还对本书的手稿提出了建议,而且,她的爱和支持对我也非常重要。

目 录

杜威归来(丛书总序)/1

前 言/1

序 言/1

第一部分 基督教的民主重建

第一章 统一性的追求/27

第二章 新黑格尔唯心主义和新心理学/77

第三章 基督教自由主义和社会行动/125

第四章 “真理将使你自由”/171

第二部分 通向自由与社群之路

第五章 民主、教育和宗教经验/223

第六章 实用主义、进步主义和战争/273

第七章 诗歌、书信与功课/319

第八章 自然、科学和价值观/369

第九章 进化世界中的道德生活/411

第十章 宗教人本主义/459

第十一章 自然、上帝和宗教情感/507

第十二章 “恩典的礼物”/563

参考书目/589

索 引/603

译后记/613

序 言

1

下一个宗教预言家,若想对人类的生活拥有持久的、实在的影响,必须能够向世人阐明民主的宗教意义,即川流不息的生活本身的终极的宗教价值。而这可以与基督为他的时代所做出的贡献相提并论。

——约翰·杜威,1892

约翰·杜威生于1859年晚秋,在佛蒙特州的一个繁华的小镇伯灵顿(Burlington)长大。该镇为群山环抱,地处大峡谷之中,湖光山色呈现出令人敬畏的美;开疆拓土时代那种锲而不舍、崇尚自由的精神仍然弥漫在这里的空气之中,全镇会议构成了蓬勃向上的、民主的自我管理的核心。这里的男男女女忍受着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依靠清教伦理约束自身的欲望,信奉加尔文教的二元论,认为上帝与世界、精神与肉体、天堂与地狱是截然二分的。杜威出生后不久,他的祖国就陷入了一场极为可怕的破坏性的内战之中。内战使得杜威的父亲抛妻别子长达5年半之久。南北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美国却又陷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混乱冲突之中。正是在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其生物进化理论极大地加剧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论争,众多美国人遭受到了极大的困惑,无法排解理智与情感的分裂。杜威童年经验中无疑存在着许多积极的方面,但是他成长于其中的世界也的确充满了尖锐的对峙、令人感到痛苦的隔离、剑拔弩张的冲突和敌意。

2

就天性而言,年幼的杜威腼腆而敏感,温和而富有怜悯之心。另外,他很早的时候就显示了一种罕见的能力,思考问题的时候能够做到眼界开阔、符合条理。若考虑到他所具备的才能和他成长的世界中存

在的种种对立(divisions),就不难理解他对统一性的热切追求,也不难理解他何以最终成为一个致力于克服种种二元论的哲学家,长期呼吁克服人的经验中所有那些压抑人的生活、制约人的成长、妨碍社会的进步,从而招致冲突与痛苦的对立与分裂的现象。他的哲学工作是一种孜孜不倦的、持之以恒的努力,目的就是打破主观与客观、经验与自然、心灵与肉体、义务与欲望、个人与社会、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手段与目的、道德价值与科学、宗教与世俗、精神与物质、上帝与世界等种种二元对立。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对立中,杜威发现了他认为他的时代所存在的社会和思想问题的症结。对于他来说,克服这些对立既是个人自由与成长的道路,也是通向社会正义的必经之路。

杜威借鉴了当时通行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哲学语言,将困扰人们生活的最广泛的二元论,概括为理想与现实的二元论。因而,在他看来,个人和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统一理想与现实的问题。这是杜威探讨人的种种价值观念和善恶冲突时所使用的通用术语。在当代民主和技术的文化中,寻找统一理想与现实,即实现理想、创造世界的方法,是作为思想家的杜威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要实现自我统一、自我与世界的统一,从而获得自由与建立社群,这是唯一之路。只有与这一主导性的目标联系起来,杜威各种专业哲学兴趣的完整意义才能够得到理解。

- 3 尽管杜威的文章往往缺少文采,不容易懂,但他对于种种二元论的抨击却是成功的,因为他抓住了困扰众多美国人的问题,对于新世界生活中的种种可能的理想,也能做出令人憧憬的描绘。因而,很少有哲学家能够对其时代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他与查尔斯·桑德斯·波尔士(Charles Sanders Pierc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一起发起了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独树一帜的美国哲学运动,而且,在生命的晚年,他享誉国内外,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美国哲学家。然而,杜威绝不仅仅是一个掌握了学术训练,具有创见的哲学家。杜威人生观的形成期恰好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会之际,而这个时代产生了美国人追求改善生活的愿望,杜威也得以成为这个改革时代的哲学代言人。正是在这个时代,美国发现边疆不再是无限的,有必要认真对待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

城市化而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也是一个具有高度理想和希望的时代,众多男男女女,秉承美国人特有的自信,重新投入到为普罗大众宗观民主的允诺之中。杜威处在这场运动的前沿。他的思想就是在这场运动的最为美好的理想和热忱的熏陶下形成的,而他也得以成为该运动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领袖。他既是社会批评家,也是希望的预言家。

杜威非常推崇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事业和新兴的社会科学,认为它们是民主社会中最为有效的人类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工具。他在教育方面的论述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他被看做是儿童的解放者,还接受了日本、墨西哥、俄国、南非、土耳其和中国等国政府有关教育的咨询并在上述国家进行演讲,在中国他还生活了两年。杜威发现,科学方法是塑造现代世界的最具潜力的力量,还发现了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危险。为此,他倾注全力试图将科学的创造力量加以人化,以便能够把握未来。为有关知识的科学方法转化为关于个体道德指导与高明的社会计划的工具,他锲而不舍地工作了 50 余年。这是其实用主义的主要关怀所在。这种哲学首先是一种世界理想化的一种线略和方法,为的是打破事实与价值、现实与理想的二元论法。在发展其哲学的、教育的和社会的思想时,杜威重建并捍卫了 20 世纪美国社会自由主义的核心的那些理念和价值。

杜威往往被看做是一个哲学上的实用主义者,进步主义的教育家,自由的改革家,但是,除非把杜威视为一种新的精神态度和存在方式的预言家,那种精神态度和存在方式可以被称为一种美国特有的有关精神性(spirituality)民主形式,否则,就很难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杜威对于统一性和自由的追求。就此而言,杜威预见到了任何美国思想家所能想象到的最为彻底的、激进的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杜威认为,日常生活具有有效的道德指引力,能够提供某种内在的意义与价值方向,因此,为了从根源上清除对此予以否认的种种力量,他致力于重建他那个时代的思想、道德和宗教传统。杜威早在开始学术生涯之初就认识到,科学的兴起和世俗化进程的推进使得这个问题急剧恶化,从而使得人们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感到极度困惑和无所适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杜威持之以恒地致力于彻底打破精神与自然、宗教价值与科学、神圣与世